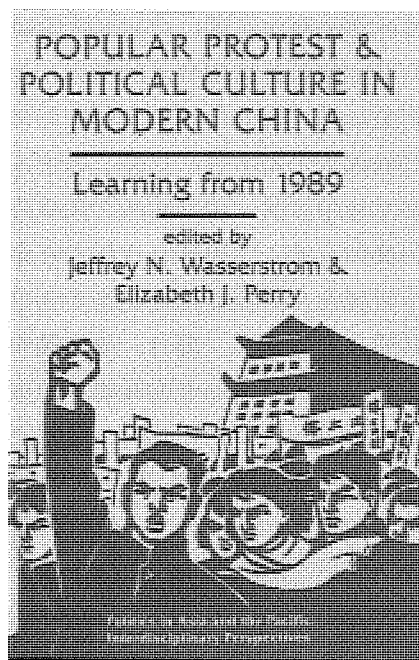


讀《現代中國的民眾抗議和政治文化》

• 徐 賁



Jeffrey N. Wasserstrom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Learning From 1989*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2).

一 政治文化理論

在1989年以後出現的眾多關於中國問題的書籍中，《現代中國的民眾抗議和政治文化》(*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①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它重提了「政治文化」，觸動我們對目前關心的文化批評的一些基本問題的思考。雖然在西方對政治文化的關心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的社會學，或者甚至啟蒙運動時期，但它真正成為政治和文化研究中的一種理論視野，卻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勃林特(M. Brint)把西方的政治文化研究追溯到三個源頭：一是從孟德斯鳩(Joseph François Montesquieu)到托克維爾(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法國社會學研究傳統；二是從康德(Immanuel Kant)到韋伯(Max Weber)的德國文化哲學傳統；三是二次大戰後在美國政治科學領域

勃林特把西方的政治文化研究追溯到三個源頭：一是法國社會學研究傳統；二是德國文化哲學傳統；三是二次大戰後在美國政治科學領域中形成的對政治文化的「科學」或者「行為功能」研究方法。

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的西方政治文化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從政治傾向來看，當時的政治文化研究是為了維護西方既有的自由民主制度；從文化立場來看，是以西方為現代化模式的。

中形成的對政治文化的「科學」或者「行為功能」研究方法^②。本世紀50、60年代在美國政治科學領域中的學者之所以對政治文化特別感興趣，大致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的原因是政治社會性的。這個時期，隨着西方社會的劇烈變化，人們的行為也出現了重大的改變，這些改變和文化的改變是聯繫在一起的。同時，這個時期在國際上出現了許多「新國家」，它們雖然採用了西方的形式體制，但政治的實際運作卻與西方模式不符，這裏也牽涉到文化因素的作用問題。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學術性的。當時政治科學領域中盛行的是結構功能方法，而且關心的主要是「現代化」問題。當時的主導共識是，技術的變化有助於形成現代意識、思想和文化，而傳統文化則是技術向現代化方面轉變的障礙。在這一主導共識下，政治和文化的關係就顯得尤其突出和重要。

以今天的認識來回顧從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的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無論從政治傾向、文化模式，還是從研究方法來看，都有很大的局限性。這些局限性都是有歷史原因的。從政治傾向來看，當時的政治文化研究是為了維護西方既有的自由民主制度，在當時世界冷戰的局勢下，它所關心的主要問題是如何避免法西斯和斯大林式的極權統治。它所提出的主要問題是：在甚麼樣的社會和歷史條件下，自由民主體制才有制度的保證？甚麼樣的心理傾向才有助於穩定這一體制？需不需要以政體成員對政體的認識來認識它？如何認識它？在政治結

構的發展和變化中，文化起的是甚麼作用？等等。從文化立場來看，當時的政治文化理論的社會發展觀是以西方為現代化模式的。當時出現的新國家紛紛採用西方政治體制模式，更堅定了西方學者認為西方代表世界發展方向的信念。從研究方法來看，它的基本關注點是個人對他們的政治社會存在的態度、理念、信仰和感覺。它分析的是個人對他們生活於其中的政治制度的心理傾向，或者更進一步，涉及個人對於特定政治對象的認知、感情和評估這三方面的傾向。這裏包含着的「文化」概念意義相當狹隘，而且它的研究過份偏重實證方法，這和當時學術趨向有關。在這以前的政治研究曾過份注重政治的形式，如政黨結構、法制的的作用、政府各部門的權力平衡等等，忽視了政治人文文化的方面。這是政治文化研究力圖糾正的，它想要在西方社會中實實在在的社會民意調查弄明白具體公民的態度、理念、價值觀和既有的自由民主制度的關係。這種政治文化研究的代表作，艾爾芒(Gabriel Almond)和伏巴(Sidney Verba)的《公民文化：五國政治態度和民主》(*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

50、60年代的政治文化研究模式自60年代末期漸漸失去影響，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西方新興的社會運動對既有的自由民主制度合理性的挑戰，以傳統／現代對立為基礎的現代發展理論在學界受到質疑，學術實證研究方法和社會改

革目的的矛盾，多種激進人文學科理論的興起，等等。但是近十年來，隨着文化研究的深入和人們對文化的興趣和認識的增長，政治文化研究重新引起了人們的重視，不斷地傳遞英格哈特(R. Inglehart)所說的「政治文化復興」的訊息^③。1989年的世界動盪和隨之以後蘇聯和東歐的巨變，以及中國與之截然不同的發展，更是重新喚起人們對政治文化的興趣。90年代Westview出版社出版的政治文化系列叢書的總編輯維達夫斯基(Aaron Wildavsky)在編輯介紹中說：「『政治文化』指的是那些對不同的生活方式有規範作用的價值觀、信仰和選擇。共同體內的人們共有甚麼樣的價值觀？其中包含了怎樣的信仰理念？他們選擇結成怎樣的人際關係？這些價值觀、信仰和人際關係又會有怎樣的政治社會後果？」目前政治文化研究關心的正是文化與政治體制、社會價值觀、社會發展機遇或限制的關係的種種問題。

二 中國政治文化

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對「政治文化」的注意在時期上和政治科學大領域有相似之處，但卻有它自己的特殊成因和過程。第一代的中國問題研究是二次大戰以後興起的，研究者大多是歷史學家出身，在他們的研究中，中國文化的延續性問題一直佔有重要的位置^④。1949年中國共產黨革命勝利，對中國問題研究領域帶來了衝擊。儘管研究者

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各持己見，但大家都共同關心這場革命與中國文化的關係，他們並不把這場革命僅僅看成是輸入蘇聯革命模式的結果，所以想探究它的意識形態和實踐究竟在多大程度和哪些方面包含了怎樣的「本土因素」。

隨着冷戰時期以蘇、美為代表的兩大意識形態陣營對壘的形成，第二代中國問題研究在對中國共產主義發展的文獻研究中，更多地關注中國革命與蘇聯經驗的相同和相似方面。這些社會科學出身的研究者從縱向的中國歷史延續性問題轉向橫向的不同共產主義革命樣式的比較研究^⑤。也就是在這種比較研究已具局面的情況下，中國文化大革命再次給中國問題研究帶來了衝擊。60年代中蘇決裂和中國式的文化革命，重新引發人們關注中國本土政治文化傳統延續性的作用和影響。這一批中國研究學者把美國政治科學領域中盛極一時的「政治文化」理論引進了中國問題研究領域。他們當中以白魯恂(Lucian W. Pye)為最重要的代表，政治文化理論的特色和局限都在他的論著中有着充分的反映。

這個時期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受實際條件的限制，它不可能進行當時政治文化研究所要求的系統嚴格的「民意態度」調查，而只能從歷史、文學以及對當代政治的印象來形成一些對中國文化的籠統概括。這些被稱作「心理分析」的印象分析，取證面狹窄(往往以港台為限)，因而後來的中國問題研究者對此多有批評^⑥。這些政治文化研究片面注重個人心理傾向與政治樣

1989年的世界動盪和隨之以後蘇聯和東歐的巨變，以及中國與之截然不同的發展，更是重新喚起人們對政治文化的興趣。目前政治文化研究關心的正是文化與政治體制、社會價值觀、社會發展機遇或限制的關係的種種問題。



白魯恂對中國政治文化的見解，一直影響學者在相關研究中的論述方向。

式的關係，一方面是受狹隘的文化概念（「文化」僅為個人態度、思想、理念的總和）所限制，另一方面也在倡導這種文化概念。而且，這種政治文化研究囿於傳統／現代兩分對立的模式，認定中國的政治文化應該為中國政治現代化發展的非常態和不確定軌跡負責，而對中國文化內部的社會政治變革因素（在一種本土意義上的「現代化發展」因素）估計不足。由於中國研究政治文化理論本身的局限，更由於60年代末期以後政治文化在政治科學大學科中的衰落，中國政治文化理論一直沒有形成大氣候，但是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尤其是白魯恂，卻一直沒有放棄這方面的研究。雖然他的中國政治文化理論仍然保留了傳統／現代的兩分框架，但他的研究重點卻也逐漸由個人心理擴大到國家社會結構問題⑦。這種發展表

示了政治文化理論所包含的「文化」概念朝越來越廣闊、能動的方向發展。《現代中國的民眾抗議和政治文化》一書也體現了這一發展的趨勢，並有意識地強調了一種辯證能動的文化觀念，這在後面還要論及。

白魯恂1981年出版的《中國政治的動力》(*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被稱為第三代中國研究的創始代表作⑧。這部討論中國上層政治和決策的著作的基本主題是：「中國政治的根本動力來自兩個方面的矛盾，中國人一方面講究共識和一致，另一方面又相信只能在特殊的、宗派性的關係中才安全。宗派關係恰恰是對共識原則的最大威脅。」從這種對所謂的中國人普遍心理趨向（白魯恂在其中看到了「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的矛盾出發，白魯恂討論了特殊宗派關係和政治派別鬥爭的關係，派別

政治和公眾政治的關係，派別政治形成中國政治的哪些不穩定因素，以及派別政治會如何動搖當時關於四個現代化的共識，等等。白魯恂的這部著作和他1968年出版的《中國政治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一樣，是從政治心理的角度來討論中國文化對現代政治的負面影響。他所指出的不少中國文化心理因素，在80年代中期中國文化熱討論中再次成為熱門話題，如官貴民賤、重人治輕法治、隨眾趨同、以道德論權威、鄙視權力卻又敬從權威等等。而且，白魯恂討論中國傳統文化阻礙中國現代化所用的傳統／現代兩分對立框架也基本為80年代文化討論者所採用，例如文化熱討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否定，強調壓制個性、官貴民賤、封建專制等中國傳統文化因素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障礙作用，對現代變革的本土資源估計不足等等。了解白魯恂的政治文化理論特徵和局限，可以為我們重新評估80年代「文化熱」提供一個頗有價值的視角。而了解新的政治文化理論，則可以幫助我們設想今後的文化討論可以從哪些方面做一些突破。我們可以把白魯恂所代表的政治文化理論和由《現代中國的民眾抗議和政治文化》所體現的較新的政治文化理論稍作比較，以增進對這二者的認識。

三 新政治文化理論

《現代中國的民眾抗議和政治文化》的編者承認白魯恂對「政治文

化」定義的權威性。按照白魯恂的定義，政治文化是「整體人群現時所普遍具有的態度、信仰、價值觀和技能，政治文化也包括人群的個別部分的特殊傾向和範式」^⑨。這個定義包括兩個部分：與普遍文化一致的部分和不一致的部分。在白魯恂的政治文化研究中，他強調的是前者，所以他往往把中國現代化的動力設想為來自中國文化外部，這和他把西方現代化看成是世界其他地區政治社會發展模式的觀點是一致的。《現代中國的民眾抗議和政治文化》一書的新政治文化研究，突出了白魯恂對政治文化定義的第二部分的意義。這個意義對於一本1989年以後出版的討論現代中國民眾抗議的論文集當然格外重要。1989年事件對中國來說到底具有怎樣的意義呢？這場事件的結果是不是代表着本土價值觀的發展規律戰勝了來自外部的「精神污染」？它是不是僅僅因外來的「民主思想」才發生的？還是本土文化本身就潛藏着社會改變所需要的積極價值觀和對抗技能？

1989年事件對中國研究領域中政治文化的復興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本書編者寫道：「(由於這次事件,)學術界不得不再次審視它對當代中國社會和政治所作的最基本的假設，……正如1949年的革命和1966-69年的文化革命，1989年的抗議在學界形成的分歧遠遠超過了共識。」^⑩更由於民眾抗議在中國和蘇聯、東歐所遭受到的不同對待和結果，文化和政治發展的關係問題變得愈發嚴峻和迫切。儘管本書關心的是政治社會變革和發展問題，

白魯恂討論中國傳統文化阻礙中國現代化所用的傳統／現代兩分對立框架基本為80年代文化討論者所採用，因此，了解白魯恂的政治文化理論特徵和局限，可以為我們重新評估80年代「文化熱」提供一個頗有價值的視角。

但它並沒有把注意力只放在當前中國人的政治心理和態度上。它的討論面要廣泛得多，涉及社會群體、體制、國家—社會關係、公眾空間、知識份子、中國文化身分等等一系列問題。

(1) 跨學科的「文化批評」

本書12位作者的學術出身背景包括了歷史、社會科學、政治科學、東亞研究等諸多學科，使得全書呈現出一種突出的跨學科的全貌。在中國研究領域中，數代學者從歷史學、社會科學、政治科學的單科側重發展到今天的跨學科綜合，對此，我們也許只能用廣義的「文化研究」來為其命名。現今討論文化的政治社會作用的，已不只是政治或社會學科出身的學者，他們的專業可以是以前被視為「純文學」的文學、哲學、語言學或文藝理論。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文化研究」只是一個籠統的說法。具體的文化研究，正如《現代中國的民眾抗議和政治文化》中每一篇文章所顯示的，都可以大致確認一個學科傾向，它為研究的分析和推論提供了基本的概念、範疇、前提和話語。中國目前有些「文化討論」不能反映論者特殊的專業素養，這表現為概念不精確、分析方法和話語沒有專業性、論證缺乏學科文獻基礎，等等，這些都影響「文化討論」的學術價值和學理深入。《現代中國的民眾抗議和政治文化》一書中的政治文化研究大多能很好地結合「文化性」和「學科性」，這不僅使得單篇能有深透的討論，而且使全書

規範了一種遠比先前心理分析政治文化理論更廣泛、更辯證、更能動的「文化」概念。

前面提到，在以心理分析為基礎的政治文化理論中，文化被狹隘地理解為個體傾向、態度或理念的總和。新的政治文化包含的「文化」概念要寬廣、能動得多。如莫蒂(P.R. Moody)指出的那樣：「(新的文化概念)和人類學中的文化概念一致，指的是人類生活中一切非生物性的方面，包括物質的和精神的。」^①文化不只包括可以通過心理分析去認識的個人傾向、態度或理念，也包括必須通過社會理論去認識的社會結構、政治體制、公眾行為和行為空間、人際互動機制等等。由於政治和政治體制都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它們不僅是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而且也為觀察、研究特定歷史環境中人的態度、理念和價值觀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釋。新的文化概念使文化討論者一方面可以說明特定政治是怎樣在大的文化環境中形成和存在的，一方面也可以說明政治如何維持和改變大的文化環境。人們對政治的態度，不再只是投射某種性格或個性，而是在特定環境中的理性選擇。

本世紀70、80年代的一些重要當代理論，尤其是後現代理論、後殖民理論和批判理論，都為確定新的文化觀念並且更深入、更全面地討論中國的政治文化提供了條件。這些理論本身就有很大的跨學科性，對當今各種人文學科有廣泛的影響。這些理論在不同的程度上滲透在《現代中國的民眾抗議和政治文化》的不少篇目中。例如艾修里克

《現代中國的民眾抗議和政治文化》一書的12位作者的學術出身背景，包括了歷史、社會科學、政治科學、東亞研究等諸多學科，使得全書呈現出一種突出的跨學科的全貌。



(Joseph W. Esherick) 和華瑟斯屈姆 (Jeffrey N. Wasserstrom) 的〈演出民主：現代中國的政治舞台〉(“Acting Out Democracy: Political Theater in Modern China”)一文，就反映了後現代理論在討論社會和政治問題中對先前政治文化理論概念和範疇(如白魯恂的「社會化」、「世俗化」等概念)的擴展。它所使用的概念，如「象徵」、「語言」、「儀式」、「解釋」等，帶有典型的後現代理論話語的標誌。兩位作者把中國的政治文化看成是一個既有共識又有衝突的公眾場所(舞台)，把1989年事件當作「政治舞台上的一次表演」來進行分析。例如，他們

詳細分析了學生抗議如何從中國家喻戶曉的國家儀式「腳本」和傳統「節目」中汲取靈感和素材。官方的儀式(如遊行、慶典、開大會、立紀念碑)是營造官方權力形象必不可少的象徵手段。學生抗議將多種官方儀式改寫為另有含義的政治劇目。他們在象徵政府權威的天安門廣場上先佔場後演戲，對胡耀邦的「葬禮」(一種被官方挪用的傳統「節目」)進行反利用。他們不僅把人民英雄紀念碑納入了自己的抗議語言，還添加了像「民主女神像」這樣的非正統符號。學生在廣場和街頭演出的節目有的是本土性的(如在人民大會堂前的「跪諫」)，有的則

1989年的事件對政治文化在中國研究領域的復興，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艾修里克和華瑟斯屈姆把中國的政治文化看成是一個既有共識又有衝突的公眾場所，把1989年事件當作「政治舞台上的一次表演」來進行分析。

對中國本土文化因素的概括和抽象往往可能有兩個性質不同，但互有聯繫的誤區。第一個誤區與當今後殖民批判揭露的「東方主義」有關；第二個誤區與第三世界國家自我孤立的民族主義有關。這兩種誤區都起因於文化本質論。

具有國際性(如「絕食」)。所有的演出手段都是為了一個目的：感動觀眾，因為政治戲劇和普通戲劇一樣，它的力量只能來自觀眾。

(2) 能動和差異的「文化」

《現代中國的民眾抗議和政治文化》的作者們力圖糾正用單一靜止的觀點去看待中國文化。對任何文化的概括和抽象都是必要的，但這種概括和抽象則往往會掩飾具有重要政治和社會意義的差異。本書作者們對即使同一時期(1989年前後)、同一社會階層(如知識份子)或同一文化形式(上層文化或大眾文化)內部差異的關注，反映了中國研究領域中也在發生從總結普遍模式到分析意義差異這一轉向。在白魯恂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對中國本土文化因素的概括和抽象佔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這種概括和抽象往往可能有兩個性質不同，但互有聯繫的誤區。第一個誤區與當今後殖民批判揭露的「東方主義」有關。「本土」和「非本土」的兩分對立往往導致用西方的「現代化」來衡量中國本土文化因素(與現代化不相適合的「傳統因素」)，因而得出否定的結論。第二個誤區與第三世界國家自我孤立的民族主義有關。本土的文化特性往往被用來作為國家政治我行我素、拒絕國際輿論批評的藉口。這兩種誤區都起因於文化本質論。《現代中國的民眾抗議和政治文化》的研究結果表明，這種文化本質論並不適用於中國當今政治文化的實情。中國社會中的保守和改革力量的區別，不能簡單地等同為

「傳統」和「現代」的區別。討論中國「政治文化」，必然會涉及到中國文化的延續性問題，涉及這種延續性與中國現代化關係的問題，涉及中國現代化的性質、目的、評估標準等一系列問題。打破傳統／現代的兩分對立觀，必然對我們重新認識文化延續性和中國現代化的眾多有關問題產生重要的影響。我們當然不能期待任何一本論文集一下解決那麼多與這兩個問題有關的問題。但是這本論文集以其對傳統／現代兩分對立觀的否定和批判，讓我們看到，既然相互排斥的理想型的「傳統」和理想型的「現代」的對立並不適用於中國，那麼，我們完全可以不必只從外部來為中國社會改革和現代化尋找動力和資源。設想和實踐中國的改革和現代化，需要調動一切可能的資源，外來的和本土的，但任何一種資源都不是現成的，而必須由文化參與者和批評者通過理論的建構和實踐的努力去實現。

(3) 文化政治的機遇和限制

新的政治文化理論雖然充分肯定中國政治文化本身有助於變革的因素，但它對中國政治發展的順利程度並不採取盲目樂觀的態度，而是旨在從多方面同時揭示中國社會變革的可能和限制。而且，它也比以前的政治文化理論更關心那些似乎遠離上層政治和精英文化的大眾政治文化。文集中阿納諾斯特(Ann Anagnost)的〈社會主義倫理和法制體制〉(“Socialist Ethics and the Legal System”)一文，就是從

民眾抗議的另一方面——官方對抗議的控制——來討論中國政治發展的一些限制。阿納諾斯特這篇文章具有批判理論的特點，它通過分析當今中國政治意識形態的特殊控制形式來認識其「後極權」性質，而它的研究對象卻是普通農村裏的「鄉規民約」。「鄉規民約」在改革時期出現時，被譽為中國鄉村基層民主式的自我管理的新體制。但是「鄉規民約」與法制和社會倫理的關係是曖昧不清的。「鄉規民約」一方面有意在基層鼓勵村民限制地方幹部，尤其是經濟領域中的濫權；另一方面，它的主要任務是維護「穩定」，防出「亂子」。「鄉規民約」的曖昧性反而使它「成為建設它本欲限制的那種權力的手段」^⑫。

阿納諾斯特認為，「鄉規民約」在農村所起的作用，頗能說明中國當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關係的某些新特點。首先，統治意識形態表面上淡化，但實際上仍極端重要。意識形態的基礎由未來的理想社會圖景轉化為普通人日常生存的切身利益。其次，基層政府機能發生轉化，它以前作為黨的意識形態控制的執行機構的性質淡化了，現在佔據着一種介於黨的意識形態操作和新建立的法制體制之間「曖昧不清」的地位。阿納諾斯特指出，在新形式的意識形態話語中最有力量的說法是「防亂」。「社會動亂」一說同時借重人們對文革之「亂」的記憶和來自儒教傳統的「和為貴」。這一意識形態話語本身充滿了曖昧性和矛盾性，它把政治自由和社會不穩定直接等同起來。它一反共產黨自己一向與「和為貴」針鋒相對的「階級鬥

爭推動社會前進」的哲學，還把政治上極端不自由的文革時期用作因政治自由造成社會動亂的典型。問題是，這樣一種充滿曖昧和矛盾的意識形態怎麼還能起到統治作用？阿納諾斯特的回答是，它確實能起到統治作用，但這是一種特殊的統治作用，顯示中國政治制度已經進入了一個新形態：「後極權」。「後極權」這一說法語出哈維爾(Václav Havel)：「後極權處境中的權力的聲音已經不再可信，但它仍然能夠迫使受它控制者和它同謀，一起裝作那聲音仍然是可信的樣子。」^⑬阿納諾斯特指出，在今天的中國，「統治權力迫使被統治者與它同謀『裝樣子』，它依靠的是更巧妙的政治恐怖手段」。阿納諾斯特提醒人們要充分認識新形式意識形態控制的特殊有效性，「否則我們如何能解釋黨至少在表面上成功地使老百姓接受它對1989年事件的解釋？」^⑭

新的政治文化理論並不能替我們預言中國是否只能長久是現在這個樣子，或者中國是否最終會認同西方自由民主或者其他甚麼政治模式。但它卻向我們指出，一個社會的變化一定不能離開它的本土文化所提供的資源，而這種資源是統治力量和對抗力量一直在爭奪的。文化批評的一個基本任務就是促使這一爭奪朝着有利於社會進步的方向發展。新的政治文化理論把社會變革要求和實踐當作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它關心政治和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但其目的不在於建立某種政治理論，而在於用文化為多種不同的政治理論提供一個寬廣的解釋

阿納諾斯特指出，在新形式的意識形態話語中最有力量的說法是「防亂」。這一意識形態話語本身充滿了曖昧性和矛盾性，是因為它把政治自由和社會不穩定直接等同起來。

角度和分析語境。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政治文化研究是一種文化討論，也是一種具有政治意識和社會變革要求的文化批評。

註釋

① Jeffrey N. Wasserstrom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Learning From 1989*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2).

② Michael Brint: *A Genealogy of Political Culture* (Boulder, CO: Westview, 1991).

③ Ronald Inglehart: "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2, no. 4 (December 1985), pp. 1203-1230.

④ 這些研究者包括 John King Fairbank, Karl A. Wittfogel, Benjamin Schwartz, Joseph R. Levenson 等人。

⑤ 這些比較研究可參見 Donald W. Treadgold, ed.: *Soviet and Chinese Communism: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Chalmers Johnson, ed.: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Thomas P. Bernstein: "Leadership and Mass Mobilisation in the Soviet and Chinese Collectivisation Campaigns of 1929-1930 and 1955-1956", *China Quarterly*, no. 31 (July-September 1967), pp. 1-42.

⑥ 參見 Lowell Dittmer: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in Amy Wilson et al.: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New York: Praeger, 1983), pp. 51-68; Richard Kagan and

Norma Diamond: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Pye, Solomon, and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5, no. 1 (July 1973), pp. 62-68; John Gittings: "Bringing Up the Red Guard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6, 1971), pp. 13-17.

⑦ 白魯恂在80年代中期的著作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MA: Belenap,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進行的是比較研究。1992年重版的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去掉一篇舊文，另收入兩篇新文。其中一篇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是對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1981) 一書的總述；另一篇 "Erratic State, Frustrated Society" (原載於 *Foreign Affairs* (Fall 1990), pp. 56-74)，討論的是中國文化在形成社會結構和國家—社會關係中的作用，不再借重個人心理分析。

⑧ Harry Hard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 of Scholarship",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2 (January 1984), pp. 284-307.

⑨⑩⑪⑫⑬⑭ 同註①，pp. 2, 11; 3; 178; 181; 181。

① Peter R. Moody, Jr.: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 1994), p. 732.

徐賁 1982年復旦大學文學碩士，1991年獲麻省大學(Amherst)哲學博士。現任加州聖馬利亞學院英文系副教授。